

■财富人物 I

上药吴建文:从青年才俊到索贿巨贪



■财富评论 I

贫富差距令人震惊 揭开作家富豪榜 遮掩的真相

11月21日,“2011 第六届中国作家富豪榜”公布了,很多人不以为然的郭敬明以 2450 万元的年度版税收入高居榜首,南派三叔、郑渊洁,分别以 1580 万元、1200 万元尾随其后。

那些荣登富豪榜的作家,让人们艳羡不已。纵然其中有一些人让人不以为然,甚至很不屑,但他们能登上这个榜,多少证明有可取之处;如果再把眼光向下,看看那些富豪榜之外的作家,就可以知道他们的生存艰难。

媒体面对面专访了 4 位具有代表性的中国作家,他们的贫富差距令人震惊,有的作家全部存款不足 5 万元,有的作家辛苦一年能挣 10 万元,有的作家一年收入远超 1000 万元,有的作家已是亿万富翁。这就是文字圈的真实写照,浮于水面的永远都是极少数,对于大多数作家来说,仅仅靠文字,甚至连生存都成问题。

现实总是让人们纠结,很多人为着理想而码上了文字,在这里,投入了太多的精力和梦想,而回报却是那么 的 吝啬。历史上,书生似乎总被人贴上穷的标签,但就与其他行业的对比来说,恐怕也没有多少时候像今天这样,文字那么不值钱。放眼我们的身边,穷书生比比皆是,几元钱的一首诗,几十元的一篇千字文,甚至对于大多数的人来说,辛辛苦苦码出来的文字根本就没有见光的机会,好不容易见光了,也会遇到拖欠稿酬等问题。生存的压力,对于作家来说,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沉重。

这些年我们总在感慨传世之作缺失,总是羡慕国外精品选出,千万不要忽视了,我们的作家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下写作?明白了这一点,才会明白他们坚持梦想的可贵与不易。很多人感慨,这些年来什么都涨价,请不要忘记,有一个东西起码没涨价,那就是稿酬。一边是不值钱的文字,一边是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呼声,两者之间,显得是如此的格格不入。码字的不如唱戏的,码字的不如经商的,码字的不如当官的……当码字的什么都不如,不值钱的文字,能够培育出文化大繁荣吗?

一个作家应该在精神上让人仰视,但也不能在物质上让人鄙视。祝贺这些登上富豪榜的作家,不管如何,他们的存在多多少少给了许许多多文学爱好者的信心,让一些人心始终保存着梦想的光亮。虽然,光亮是如此的微弱,成功是如此的偶然。

(摘自《中国青年报》)

上海医药(集团)有限公司原总裁吴建文因受贿、挪用公款、贪污等罪,涉案金额高达 5100 余万元,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28 岁便成为国企高管的青年才俊,为何走上贪腐之路?他的案例,为国企高管监管带来哪些警示?

从受贿到索贿,胃口越来越大

“索贿”、“索贿”、“索贿”……吴建文的一审判决书上,这样的字眼比比皆是。

吴建文生于 1969 年,1991 年大学毕业后,进入国有企业上海新亚药业公司工作。

短短 6 年,他就被提拔为公司副总经理,之后又担任新亚药业总经理、董事长,新先锋药业公司总经理,上药集团抗生素事业部总裁,以及上

药集团总裁兼新先锋药业公司董事长。

2001 年,时年 32 岁的吴建文已经是上海新亚药业公司总经理,公司办公楼改建项目承包商郭某向他行贿 20 万元。起初接受这笔受贿,吴建文坦言:“很紧张,彻夜不眠。”

然而,贪欲渐渐膨胀。



据纪检部门调查,吴建文很快就满足“你给我收”,而是直接向他人索贿,以各种理由“骗贿”。

2003 年 2 月,吴建文向承包商郭某索贿 12.8 万元购买车位;当年又索取一辆价值 51.8 万元的丰田越野车;次年,再次向郭某索取 100 万元,用于在北京购房。

2007 年 5 月,吴建文对求他在办公楼租售中“行方便”的吴某称,自己的外甥准备出国留学。吴某“明白这是找借口要钱”,于是将 20 万元打入吴建文指定的银行账户。

令人吃惊的是,2009 年,吴建文明知组织上正在对自己进行调查,竟然还向他人索贿 60 万元。

吴建文月收入约 3 万元,已属高薪一族。但他看到身边医药商人发大

财了,内心不平衡,于是谋求用权力换取金钱。

在吴建文帮助下,重庆煜澍丰医药有限公司负责人杨某获得了药品“兰菌净”的代理权,该药品每年销售额高达 1000 多万元。

法院一审查明,2000 年以来,吴建文共受贿 30 多笔,涉案金额高达 1187 万余元,年均受贿 120 万元;伙同他人侵吞公款 500 万元;挪用公款 3355 万余元归个人使用,至今仍有 1485 万元未归还;隐瞒不报境外存款港币 110 余万元。

票子、车子、房子,贪欲难以满足

钱权交易进一步激发了贪欲,吴建文受贿的价码水涨船高。

2009 年底,吴建文向寻求药品代理权的杨某索贿 60 万元。据杨某回忆,“我坐在他家客厅的沙发上,把装满钱的袋子给了吴。”

吴建文的前妻刘某提供了不少细节:“2003 年,在自己家一处正装修的别墅里,行贿人吴某塞给我一个纸袋子,里面是 20 万元现金。”

除了收取现金,吴建文还让一些行贿人为自己办银行卡,要求行贿人不断“打钱入卡”,一次开口至少 10 万元。

2003 年,吴建文向行贿人郭某提出,需要一辆越野车用于打高尔夫球。郭某于是以吴建文名义买了一辆价值 51.8 万元的丰田越野车。

2006 年,吴建文又向吴某索取价值 75.6 万元的沃尔沃越野车一辆;吴建文还收受另一名行贿人朱某 33.8 万元购买的一辆宝马轿车。

吴建文在上海、北京、南京等地拥有多处房产,大多是受贿所得,或为行贿人资助。

2003 年,山东某医药公司董事长彭某向吴建文提供了 130 万元,为其在北京市海淀区购买了两套房产。2007 年,吴建文收受上海韦诺药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石某提供的南京栖霞区一套房产,时价 112.7 万元。

监管力度仍不足,国企高管应公示财产

吴建文不到 30 岁即担任国企高管,可谓平步青云,他精通业务、头脑灵活,但由于自律不严,他律缺失,最终难逃厄运。从少年得志到贪腐堕落,吴建文案引起了社会关注,也给有关组织监管部门敲响了警钟。

纪检、司法机关表示,当前针对国企干部犯罪的预防和惩戒,客观上还存在监管力度不足、资金财物流转较为复杂的情况。

例如,吴建文长期兼任下属两家企业的董事长和总经理,造成董事会和经理层“一人说了算”,为吴建文贪腐提供了可乘之机。

专家表示,吴建文的情况并非孤例,一些地方国企高管不时爆出贪腐大案,表明了国企监管的缺失。

上海市律师协会刑事业务研究委员会主任林东品指出,当前不少国企设立了董事会及独立董事制度,但在实际操作中还存在漏洞;其次,未上市国企也应该进行信息披露,以便于公众监督;此外,国企高管还应实行“财产公示”。

华东政法大学教授孙万怀说,“应该看到,党纪国法有关国企高管的制度规范已经不在少数,当前最重要的,还是如何将这些制度落到实处,在执行方面下功夫。”

(摘自《人民日报》文 / 杨金志、黄安琪、陆文军)



你所不知的盖茨

有人问盖茨,计算机软件和接种疫苗,哪一个成就对他而言更重要。盖茨说:“这真的很难比较,如果从拯救生命方面而言,疫苗当然更重要,但是二者在我人生中有同样的意义。”

今年 9 月的一天,比尔·盖茨在贫穷国家乍得发放了一批预防小儿麻痹症的疫苗,盖茨捐赠的疫苗价值超过了 60 亿美元,这是史上最大规模的慈善捐赠。让人欣慰的是,对盖茨而言,这只是开始,他还计划投入更多的资金和精力用于消灭疾病。盖茨说:“如果 25 年以后,小儿麻痹引发的死亡率还是超过 80%,就证明我的工作没有做好。”

1997 年,盖茨和妻子梅琳达第一次投资公共健康领域,他们主要关注人口控制。他们认为,健康与人均占有资源成正比,既然资源是固定的,那么获得健康就要控制人口数量。但是在了解了更多数据后,盖茨改变了想法。研究表明,在各种类型的社会里,当死亡率下降,特别是 1000 人中死亡率低于 10 的时候,出生率也会下降,人口增长将保持稳定。很多父母之所以生 8 个孩子,不是因为想要一个大家庭,而是觉得很多孩子会夭折。梅琳达说,如果父母确信自己的孩子能长大成人,他们自然会控制人口。

此后,盖茨的态度发生了 180 度的转变,他不再关注控制人口,而是努力拯救那些已经出生的孩子。他捐赠的重点是疫苗,因为疫苗效果更好而且非常便宜。他们的第一笔捐赠金额是 1 亿美元,主要用于购买现有的疫苗,并交付给联合国。1999 年,他们成立了自己的基金,并随后改名为比尔梅琳达盖茨基金会,首批拨款 210 亿美元,马上就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慈善组织。

盖茨可以捐很多钱用于购买脑膜炎和疟疾疫苗,也可以创造一个供应体系,以便更有效地分配疫苗,但完成这些工作后,他开始思考更严峻的问题,如何才能让辉瑞、GSK 以及默克这样的大制药公司生产出大量昂贵的疫苗,并将它们用在最需要的孩子身上呢?很快盖茨想出了办法。

首先盖茨意识到应该建立一个长久的公私合作机构。公共部分很快通过他的资金解决了,但是私人部分没有棘手。相比于制造药物,生产疫苗更困难也更昂贵。1999 年,通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世界银行、联合国以及各大制药厂和援助团体的斡旋,盖茨成立了全球疫苗和免疫联盟(GAVI),并为此投入了 25 亿美元。GAVI 取得了辉煌的成果,有 340 万儿童远离了乙肝,120 万儿童远离了麻疹,56 万儿童远离了流感嗜血杆菌,47.4 万人免除了百日咳的痛苦,还有 14 万人不用担心再患黄喉病。

尽管仍然有人对盖茨存在非议,但盖茨慷慨的捐赠还是获得了更多人的认同。诺华公司疫苗部门主管 Andrin Oswald 说,盖茨有力地保证了数百万发展中国家孩子远离死亡。因根除天花病而闻名于世的 William Foege 说,过去十几年发生的事情是我们从前做梦也想不到的,世界将因此而改变。

有人问盖茨,计算机软件和接种疫苗,哪一个成就对他而言更重要。盖茨说:“这真的很难比较,如果从拯救生命方面而言,疫苗当然更重要,但是二者在我人生中有同样的意义。”

(摘自《国际金融报》)

■财富话题 I

美国 138 名富豪联合上书 请求政府对其多征税

近日,美国 138 名百万富翁联合上书国会,表示:从国家利益考虑,应向美国富人多征税。

这些企业和商界领袖说:“良好的经济曾让他们受益,现在到了回馈社会的关键时刻,应该让更多人得到好处。”对此,《全球华语广播网》美国观察员余东晖特作如下评论:

美国 138 名爱国富豪请求给自己加税,实际上是在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就如何减少目前债台高筑的美国财政赤字产生严重分歧的背景下发生的。美国联邦政府的债务目前已经高达 14.8 万亿美元,今年曾经发生国会两党就提高借债上限僵持不下,差点导致美国发生债务违约的问题。如何削减赤字是美国财政的重中之重,但民主共和两党始终存在着严重的分歧。

奥巴马政府和民主党议员认为要削减财政赤字,必须增加税收来

源,但在目前经济不景气的状况下,显然是不能对普通的老百姓增加税收,那么怎么办呢?他们就把目标对准了富豪,也就是结束了布什时代定下的给年收入 25 万美元以上的富人减税的政策。而共和党人则坚决反对这个做法,他们认为要最终减少财政赤字不能劫富济贫,而是要靠做大经济蛋糕。

另外他们还反对民主党的“大政府”做法,认为奥巴马必须缩小政府规模,减少财政的浪费,再谈给富人加税。两党几近拉锯,奥巴马就提出了对年收入在 100 万美元以上的超级富豪增加税收。

过去 10 年美国的经济政策基本上是向富豪倾斜,即便在金融危机的救市当中,大量的钱也是流向华尔街,银行大亨年底红包不减反增,而中产阶级则经历了收入增长停滞,对未来忧虑滋长的失落的十年。尤其是

在金融危机下,他们更担心失去工作,而堕入穷人的行列。

近期的各种数据表明,过去 10 年美国贫富差距在扩大。华盛顿邮报和美国广播公司 11 月 9 日曾经公布了一项民意调查,调查发现,61% 的受访者认为美国最富人群与其他人的收入差距比原来扩大了,其中 37% 的人认为差距比原先扩大了很多,60% 的人认为联邦政府必须采取措施来缩小贫富差距。这也反映了美国公众对大公司和富人从政府政策中更多得益的不满情绪在滋长,这是近期占领华尔街运动蔓延的民意基础。

资本总是追逐利润的,人要是有空子可钻,谁都希望少交税。138 名爱国富豪要求给自己加税,也许他们是出于真心自愿的,但是并不能强求每一个富人,而是要靠政策、靠制度来缓解社会的贫富悬殊。因此奥巴马政

府提出的给年收入 100 万元以上的富人加税的政策,现在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支持。

一项民调显示,70% 的公众支持给年收入 100 万以上的超级富豪加税。我认为根本上还是要靠做大经济蛋糕,提高经济的活跃度来让绝大多数的民众受益,而这不能靠大公司,而要靠制定扶持中小企业的制度和政策,这样才能提高就业率。

另外还要有一个健全的制度来实现财富的合理转移,比如说给中产阶级更多的减税政策,鼓励富人做慈善事业等等,在做慈善事业方面,美国有许多经验值得中国学习,美国的税收体系是鼓励富人去做慈善事业。慈善捐赠越多,其省下的钱也越多,而富人通过捐赠获得的好处除减税之外,还可以获得社会公众的认可,自己也有成就感和快乐感。

(摘自《中国广播网》)

浙江跑路潮蔓延 多家企业老板再度携款出逃

浙商跑路潮此起彼伏。

11 月 11 日,温州瓯海区老年公寓“芙蓉山庄”大股东刘加顺跑路,据当地民政部门初步统计其拖欠债务 1.07 亿元。

紧接着,12 日,浙江麦浪实业有限公司老板周子龙携款 3 亿出逃,被骗的 50 多名受害者已联名报案。湖州某投资公司老板跑路,涉及资金十数亿元。

“温州有两个肿瘤,一个是高利贷,一个是高房价。”全国人大常委会、经济学家辜胜阻向本报记者表示。

跑路风波仍在延续

“我们的血汗钱呐,都没了?”74 岁的潘奶奶至今不敢相信这是一个集资骗局。

2007 年,潘奶奶老伴去世,子女出国,她住进了离温州市区较近的美蓉山庄。每逢年节,山庄负责人都会邀请老人们聚餐,在席中劝老人集资,并承诺年息近 20%。在高回

报的鼓动下,潘奶奶先后投入了 60 多万元养老钱“借给他们做生意”。

然而,高额的回报却迟迟没来,老人们就催山庄还钱,对方答复 2011 年 9 月 17 日集中还款。如今整整两个月过去了,钱没拿到,山庄老板刘加顺和他的儿子刘明与却跑路了。

据本报调查,芙蓉山庄始建于 1998 年,一期建设土地以协议出让方式购得,政府还在税收等方面比照社会福利机构标准给予许多优惠。但到 2008 年第二期土地公开挂牌,该山庄以 2188 万元竞标成功,但导致经营成本和风险增加。截至目前,二期工程仍未完工。

11 月 13 日,记者在芙蓉山庄看到,该公寓已停水多日,食堂停用,物业管理基本瘫痪。

潘奶奶对记者说,山庄内的老人大概有 30 来户,由于目前无人管理,住宿环境非常恶劣,很多老人已经暂时回到子女家中居住。

“他们以福利事业和生态农业的

旗号集资,还拖欠山庄二期工程款。”一位知情者称。

据初步统计,芙蓉山庄总共拖欠老人及其他债务人的款项有 1.07 亿元。

当地金融机构也因民间借贷受到影响,如温州龙湾农村合作银行涉农贷款占比 60% 左右,超过半数贷款参与了民间借贷。各类有问题企业信贷资金贷款余额 15.86 亿元,票据 9.06 亿元。

浙商投资促进会秘书长蔡碧说,温州最近出现的最疯狂最高的利息是一毛五,这意味着借 100 万资金,一年要还 180 万利息。这种畸形融资方式,是企业加速走向灭亡的祸根。

企业生存危机加重

与芙蓉山庄相比,湖州某投资公司老板的民间借贷堪称“大手笔”,其涉嫌走近 20 亿民间资金。

浙江省工商联负责人表示,浙

江部分地区民企融资难直接导致高利贷肆虐,“三分、五分、一毛的都在借,制造业不可能有这样的利润”。

官方监测显示,浙江多地面临空前的民间债务危机。今年 7 月、8 月、9 月,浙江民间借贷利率分别为 30.3516%、30.0851% 和 28.4819%。而同期,湖州分别为 30.4685%、29.9466% 和 31.1446%,大有超过温州之势。

“企业家现在是高风险人群,一不小心就变成‘两院’院士,要么进法院,要么进医院。”浙江丝绸之路集团董事长凌兰芳向本报表示,“国家到 10 月份已完成全年 10 万亿的税收,涨幅 30% 多,我们企业利润有没有涨?”凌兰芳呼吁有关部门减低税负,“否则中小企业又要死去一批”。

辜胜阻则认为,温州问题的解药为“放”与“扶”:放是放开市场,特别要加快垄断行业的改革;扶就是通过减税、减费、贴息等方式,提高产业回报率,引导民间资本重回实业。

(摘自《21 世纪经济报道》文 / 刘华)